二十一世紀評論

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

編者按：2026年3月23、26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第七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有幸邀請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奇生教授蒞臨主講，王教授並與安東強教授（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李里峰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學衡研究院）以「二十世紀中國的三場革命」為題舉行座談會，分享對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與中共革命的學術新見。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為題，將座談會發言內容整理成文，嗣經作者修訂後刊出，以饗讀者。

「革命的對手方」視野下的辛亥革命

安东强

自湯武革命以降，「革命」一直是中國政治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樞紐議題。在王權和皇權的體制之下，「革命」關乎的是王朝統治的正統性問題；迄至二十世紀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在現代民權與黨權的法理之下，「革命」不僅涉及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合法性問題，而且演繹成為貫通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和各群體的運動。辛亥革命恰是「革命」從中國傳統政治走向現代政治的過渡階段，也是中國革命在吸收借鑒法國大革命、列寧的世界革命等外國革命因素之後仍能保持中國特色的關鍵所在。

在起步較晚的中國近現代史領域中，辛亥革命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學術領域，經過數代學人的辛苦耕耘和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已然成為一個能與中國古代史研究進行對話的「學術高原」①。同樣值得思索的是，二十世紀以

來在中國古代史領域的一些關鍵學術假說，如「唐宋變革論」，恰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從辛亥革命的認識出發所提出來的。

一　反思革命史觀

若就中國學術界關於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特色而言，無疑首推革命史觀。在1949年以前，辛亥革命是中國國民黨史和中華民國史的資料整理和著述的重要對象。在學術積累方面，馮自由作出了重要貢獻，先後著述《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②，也是構建國民黨「革命史」的重要人物，這種思路深刻影響到後來台灣史學界的辛亥革命研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大陸史學界，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論述的指導下，加上1954年〈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一文的影響，逐漸形成辛亥革命研究的「資產階級革命說」的學術體系。這種研究理路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是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學說的運用，二是引入群眾史觀，比較注重人民群眾的意願和行動。最具代表性的系統著述，無疑是章開沅和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③。按照主編者的自我評價，這套書之於辛亥革命研究的學術創新，在於「對社會環境，特別是對資



第七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現場；左起：鄭會欣教授、安東強教授、王奇生教授、李里峰教授。（資料圖片）

本主義經濟發展與資產階級狀況着力較多，對保路運動等群眾鬥爭論述之詳盡亦為舊時著作所不及，對辛亥前後各個階級、階層、政派的狀況及相互關係，亦能再現當時廣闊而複雜的社會圖景」④。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海峽兩岸對辛亥革命研究的分歧，本質上是基於辛亥革命的性質認識的差異。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海內外史學界圍繞辛亥革命的性質議題，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學術辯論。據學界前輩説，直至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各方決定擱置關於辛亥革命的性質辯論。台灣學者陳三井專門撰有一書《輕舟已過萬重山：書寫兩岸史學交流》，詳細記敍了海峽兩岸有關辛亥革命研究交流與辯論的學術掌故⑤。章開沅的回憶錄《凡人瑣事：我的回憶》也對國際學術界有關辛亥革命研究的掌故進行了細緻的敍述⑥。

時過境遷，如今海內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逐漸形成共識：辛亥革命研究應從注重革命的性質轉變到革命的話語及其歷史意涵。在這方面，陳建華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一書具有開拓性的推進意義⑦，接續而上的學術路徑則不止於概念史的探索，還需要從知識制度史層面梳理「革命」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古今中外的多重歷史意涵⑧。中國大陸史學界自二十世紀90年代借鑒現代化研究範式，將研究對象從革命黨轉向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等方面，均取得重要的學術貢獻。

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趨勢和新取向的一大特徵就是努力跳出革命史敍述的線性史觀。以辛亥革命而言，其中比較容易進入且取得突破的一個路徑，便是跳出從革命黨的立場來講述辛亥革命，轉而從「革命的對手方」視野來梳理晚清革命意涵的古今轉變、革命黨人的革命活動在晚清制度結構中流動的史事聯繫。

二　何謂「革命的對手方」

「革命的對手方」概念是我過去十年來關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的一個新提法，並致力貫穿在新出版的《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脈絡》一書中⑨。「對手方」是借鑒傅斯年關於學術作品的「對手方」説法；羅志田將此稱為學術的「對手方」，意即「接受者」⑩。

「革命的對手方」首次被提出來和見之於學術實踐，是我於2016年撰寫〈清政府對孫中山的認知及偵緝機制〉一文時，嘗試從清朝統治者的視角來看孫中山自1895年10月乙未廣州（重陽）起義至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時期的革命活動，對清朝統治秩序的政治衝擊與威脅及其變遷⑪。當時我還在承擔編寫《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二卷（1906.1-1911.12）的工作⑫，雖是圍繞譜主孫中山編寫，卻一直考慮如何將譜主置於晚清的統治秩序之下。或許是因為我此前的學術研究一直圍繞清朝政治制度（教育、學政及科舉制度），所以很自然地思考在清朝政治制度結構之下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有着甚麼樣的歷史意涵。

早在二十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講「人的專史」時，以曾國藩的年譜為例，已經提出要重視清朝、敵方的視角，強調「除了譜主直接做的事情之外，清廷的措施、偏將的勝負、敵方的因應、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譜主有密切的關係」⑬。而陳錫祺晚年也專門提出孫中山研究要注意「他的敵人」⑭。可以說，這都是我後來提出「革命的對手方」的學術傳承和借鑒因素。

不過，「革命的對手方」並不只是強調「對手」或「敵方」的意味，儘管望文生義下容易引發這種學術聯想。我希望能夠從這個視角切入，思考作為一種制度的革命如何進入晚清時期的政治秩序和朝野上下的政治生活之中；反過來說，朝野上下各方(包括革命黨人)如何認識和因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本質上也是將制度史研究與革命史研究相結合。換而言之，如果說此前資產階級性質的辛亥革命史探討的是資本主義在晚清如何出現、資產階級力量及資產階級革命如何形成，或者孫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創立革命組織、發動革命及肇建共和的歷史，那麼「革命的對手方」的視角就是逐漸走向梳理和敍述清朝統治者及各方勢力如何認識和因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

這個學術思考的總結先後在〈革命的對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個學術理路〉和〈政治制度史視野中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進行表述和闡釋⑮。在這個學術理路之下，對辛亥革命會帶來哪些新的認識和理解，是衡量這個學術理路的關鍵標準。

(一)清廷如何知曉和認識孫中山

例如，我們不從革命的視角來講清朝，而是關注孫中山如何從廣東走進晚清朝野上下的視野之內。眾所周知，1894年孫中山和陸皓東結伴從廣東經武漢赴上海，謀求向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書。其後上書不成，但上書內容以〈上李傅相書〉載於1894年上海的《萬國公報》(第69至70期)，署名「廣東香山來稿」。儘管後來有學者挖掘出盛宣懷檔案中有鄭觀應向盛宣懷舉薦孫中山的信函⑯，可是對孫中山這次上書的影響較少關注，甚至有學者稱很長時間內國人都不知道此事。

其實，此說嚴重低估了當時江浙一帶士大夫交流圈的傳播影響力。1894年，頗留意新學書報的浙江平陽讀書人劉紹寬記下了所知通西學的人物，其中便有「孫文亦出自英醫」和「孫文係會匪」的記載⑰。同為浙江人的汪康年也向廣東人梁啟超探聽孫中山的底細。1895年初，梁啟超覆函稱：「孫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人之商於南洋、亞美、及前之出洋學生，他省甚少。」⑱他們關於孫中山的討論始於此，手函往復尚在乙未廣州起義之前，這需要放置在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史事脈絡之下才能理解。在乙未廣州起義事敗之後，《申報》屢屢將孫中山指為倡言種鴉片的匪徒，也是來自《萬國公報》所載〈上李傅相書〉的片面認識。由此可見，嶺南之外的晚清士大夫如何知曉和開始了解孫中山其人其事，是一個值得重新敍述的歷史故事。

對於清朝最高統治者光緒帝而言，他如何知曉有孫中山這樣一位對統治構成威脅者，同樣是一個值得釐清的問題。在很長時間裏，學界常常依據《德宗景皇帝實錄》的「光緒二十一年十月癸未」條目記載：清廷意外接到「有人奏」，知悉廣東有「孫文」和「楊衢雲」的亂黨謀逆事件⑲。那麼「有人」究竟是誰，他又如何知曉孫中山等人在廣州蓄謀起義的事件？

1985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了一批〈清政府鎮壓孫中山革命活動史料選〉，其中並無這份奏報孫中山起義的摺子⑳。由於《德宗景皇帝實錄》的這條記載依據「摺包」，即由軍機處將錄副奏摺按月或半月為一包歸檔保存的「月摺包」，按照清朝文書制度的運作成例，循此線索進而披檢《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可知其出自1895年12月2日的〈侍講學士戴鴻慈摺〉㉑。這樣便能確認在乙未廣州起義之後一個半月，始由翰林院侍講學士、廣東南海人戴鴻慈向清廷密奏，光緒帝才首次知悉孫中山的存在。其實，在戴鴻慈密奏之前，同樣在北京做官的浙江人汪大燮已經知道孫中山起義的事。同年11月24日，他致函汪康年稱「廣東孫文之事，幾成燎原，然目前亦不過一時平靜耳。如何如何？」㉒由此看來，雖然兩廣總督譚鍾麟沒有第一時間向清廷奏報孫中山等人蓄謀起義之事，但是京師的官場很快便通過各種信息渠道知道了這件事。然而，學界關於晚清官場如何認識和討論孫中山及其革命活動的研究較少，這恰是我提出從「革命的對手方」來認識辛亥革命的學術意義。

(二) 孫中山政治形象的稜鏡效應

在通行的晚清政治史的敍述範式中，1898年前後的時代主題無疑是維新變法。這也是康有為、梁啟超登上歷史舞台和發揮重要影響的關鍵時期，加上孫中山已經遠離中國，研究者較少注意到他此時在國內的政治影響。若能擺脫維新派與革命派的刻板劃分，以孫中山在國內多重政治形象的傳播為線索，便可獲得具有新意的歷史面相。1897年，孫中山的英文著述《倫敦被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 出版，他在書中以「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 自居，表現出一副「革政黨」(reform party) 的政治形象，因此也被國內的報刊描述為「維新黨」，甚至推為領袖㉓。當時在上海主持《時務報》的汪康年，於1898年赴日本與孫中山秘密接洽。而劍橋大學的漢學家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在1896年就關注到孫中山，最早預言孫中山將名垂於史，請孫中山提供一篇傳記，後收入1898年在倫敦、橫濱和上海同時出版的《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一書之中。全書共收錄2,579條中國名人傳記，其中第1,824條所收錄的內容即為「孫文」㉔。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後來的歷史敍述中此時國內已然形成維新變法的大勢，可是全書並無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的傳記。

因此，回到晚清歷史現場，從朝野上下的視角來認識孫中山及革命黨，還可以關注更多非線性史觀的歷史事實。在辛亥革命前十餘年中，晚清朝野

上下對於孫中山的言論和行蹤有着多重渠道的信息來源。除清廷派遣的駐外公使和僱用的私家偵探之外，還有國際通訊社為中國朝野提供信息。在編著《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二卷時，我已經注意路透社（Reuters）為清政府提供孫中山行蹤的電報，因此便開始留意路透社與清政府合作關係的史料。這也提示我們一個重要事實：此前常被評為腐朽頹頇的清王朝，並非對國際大勢及政情一無所知；知曉域外新動向而無真心變革，才是驅使晚清中國走向革命的重要潛流。

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可是作為一個秘密的革命組織，清廷上下何時知曉同盟會的存在是一個重要問題。當時的清朝駐日公使楊樞固然並未及時知情，就連密切關注孫中山在日本言行的日本警界也沒有洞察內情，只是觀察到孫中山的神態變化，稱「此人近日頗為意氣昂揚，自覺貫徹宿志之時已經迫近」，他的下一步計劃，就是要在舊金山、新加坡等地開設報館，「向各處華僑灌輸自己的主張」㉕。實際上，直至1906年底萍瀏醴起義爆發，革命黨人劉道一在長沙被捕受訊，清朝統治者才確切知道孫中山與黃興等人組建革命組織，所以1907年清政府積極在外交層面發動對孫中山的政治攻勢，設法迫使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

這倒不是清廷內部無人敏銳地注意到孫中山與留日學生群體的密切關係。當1905年底《民報》在日本發行後，直隸總督府就成為《民報》的訂閱者，可是袁世凱並未及時向清廷奏報此事。1906年10月，湖南最早發出查禁《民報》的告示，此後江蘇等省陸續跟進，直至1907年初上升為清廷的政令。至此，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政治態度突然積極起來，向主持外務部事務的慶親王奕劻呈遞「逆書逆報」，其中便有五本《民報》㉖，這或許為他此前購閱《民報》的舉動做了一個巧妙的收尾。

從清廷視角來審視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不僅可以反思當下通行敍述的歷史知識，而且有助於豐富孫中山在晚清朝野上下的多樣性形象。1907年，清廷對孫中山的政治評估愈來愈高，這在外國人看來都有些不可思議。6月13日，法國駐華公使巴思德（Edmond Bapst）致函本國外交部長時，認為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靈魂作用被誇大了㉗：

> 如果他〔孫中山〕在中國冒險，那他還遠遠不能激起人們對一個正在進行一場苦戰的黨派領袖應有的狂熱崇拜。他太注意使自己遠離危險，而其他人卻在冒着風險。可是，中國政府終究是用他的名字來指稱那股威脅它的力量的，而給這個人以庇護就成了中國政府眼裏明顯的敵對行為。所以如果我們不想使中國政府不滿，那我們就得同孫和他的事業分開。也許是我弄錯了，反正我不能相信，我重申一遍，我不能相信孫逸仙是一股有前途的力量，同他聯合有甚麼好處。在我看來，即使滿清皇朝垮台了，他也不會被請來當中國的領導人。

1911年武昌起義後，孫中山的政敵也以此攻擊孫中山對革命的領導與貢獻，甚至有傳聞「革命黨視孫中山為懦夫，而不急盼其回國」㉘，這恐怕是失之偏頗的意見，但倒也可以反映孫中山在國內政治形象的多樣化。

(三) 不在革命現場的革命領袖

問題在於，重大政治人物的影響力，並不能僅以人物本身的實際活動軌迹來衡量，其活動、言說、思想的政治穿透力常常是跨越時空、國家、階層的。因此，在武昌起義後民軍群龍無首之際，先是湖北軍政府方面刊發《中華民國公報》，將孫中山冠名為中華民國總統，並發布革命布告；後來江浙方面又通行各省，主張請孫中山回國組織臨時政府，稱「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於1911年12月3日擬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中規定「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㉙。這也是孫中山回國後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的法理依據。

從1894至1911年，孫中山在晚清政治視閾下的多重政治形象，固然沒有革命史觀之下的革命領袖形象那麼整齊劃一，卻反而提示我們深思他對辛亥革命的「領導」究竟有何歷史意涵。正如法國駐華公使所批評，孫中山長期「遠離危險」，長期不在國內從事革命活動，也往往不在起義活動的現場。其實梁啟超也從這個方面批評過孫中山。這都是從具體舉事或戰役層面的領導而論。

三　革命的多重維度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將「對手方」納入接受史層面的意涵，那麼在「革命的對手方」視角下，便不僅要注重革命的對手或敵方，還需要考慮革命如何為革命黨同仁接受和認可的歷史面相。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意涵正處於一個古今中外多重因素匯合的過渡時段，即使陣營內部，也存在較多分歧，從積極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革命的大合唱。

1912年12月，拒絕接受中華民國二等勳位的章太炎在書信中表示，就宣傳革命而言，自己功不在孫中山之下，認為「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勳。吾雖庸懦，鼓吹之功，必賢於中山遠矣。當庚辛擾攘以來，言革命者有二途。軟弱者與君主立憲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謬談，弟《駁康有為書》一出，始歸純粹」㉚，流露出憤憤不平的意氣之語；此外，武昌起義後湖北對孫中山曾有「革命的吹鼓手」的評語㉛，可見革命陣營同仁對孫中山之於辛亥革命的貢獻也缺乏充分的共識。

在1903年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之後，1904年初的上海《大陸報》曾披露一則〈孫文之言〉，並加按語稱：「今青年之士，自承為革命黨者雖多，實則皆隨風潮為轉移，不過欲得革命名稱以為誇耀儕輩，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之規畫者，舍孫文以外，殆不多見也。」究其根本，中國革命不止在於言論和鼓吹，更在於有真正的思想和制度規劃：「吾嘗聞彼黨人述孫氏之言曰：……中國數十行省之大，欲囊括而恢復之，必有數統帥，各將大軍數十百萬，各據戰地，嗚叱往來，即使諸統帥慕共和之治，讓權於民，為其舊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偉業，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陳橋之變所由來也。欲救其弊，莫若於軍法、地方自治法間，綰以約法。軍法者，軍政府之法也。軍事初起，所過境界人民，必以軍法部署，積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遠戰地，則以軍政府約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則受軍政府節制，無則由軍政府簡人任之，約以五年還地方完全自治，廢軍政府干涉。」[32] 可見近代中國人給傳統意義上王朝鼎革的「革命」賦予一套新的制度規劃與政治思想。

隨着同盟會的成立，孫中山與革命同仁擬定〈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將這套革命的制度規劃納入全新的革命方略之內，完成了一套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的革命演進規劃制度。其中在軍法之治階段，各省成立「軍政府」作為革命政權組織，刊發〈軍政府宣言〉等文件，凡脫離清政府的各地，軍民皆受軍法節制，「既破敵者及未破敵者，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至於軍政府長官則定名為「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向國民頒發政令布告[33]。這也是武昌起義之後，光復各省不約而同採用的政治組織方式，如此統一的制度步驟實質上反映了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制度影響。

就此而論，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意涵轉變，不僅使中國革命走出了湯武革命式的王朝易代的周期輪迴，更是借鑒域外和立足本國，使中國革命在言論宣傳、革命行動、制度規劃、政治學理與「三民主義」等多個維度實現中國本土道路的摸索與嘗試。

錢穆曾經指出：「近代的中國人，往往蔑視自己以往的政治傳統，又說中國沒有成套的政治理論，沒有大的政治思想家。當然在中國以往著作裏，很少有專講政治理論的書，也很少專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34] 這固然是一個值得深入分析的歷史現象，也是理解中國人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的關鍵。在孫中山之前，雖然已有國人在思考中國政治出路時提出一些政治主張，但是若以系統性和學理性來衡量，仍然有着明顯的缺憾。所以，孫中山在革命活動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總結適於現代中國政治的制度、學理及主義，開創一條基於傳統又有創新的中國政治道路。

勿庸諱言，孫中山的創新因素來源於歐美政治及其歷史經驗。1905年，他在《民報》的〈發刊詞〉中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正是基於歐美數百年來的政治演化，並論斷近代以來這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35]。所以

他期盼將中國革命以「民」一以貫之：報曰《民報》，黨曰民黨，種族曰民族，政治曰民權、民主，經濟曰民生。面對清廷也在派遣官員考察政治和預備立憲，他更在歐美三權分立的學理論證與制度設計的基礎上，融入中國歷史文化的因素，提出五權（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學說。在1906年12月2日《民報》紀念大會演說之後，連旁聽的章太炎也覺得「目下言論漸已成熟，以後是實行的時代」了[36]。

當「革命的對手方」的學術視野融入傳播史或接受史的理路，辛亥革命時期已成系統的革命話語體系如何在海內外傳播和被認識、接受，都是必須重新檢討的重要問題。孫中山反覆強調中國革命與義和團運動不同，與歐美政治有着相近的學理與主義，是一種文明的革命。可是他言說革命的域外對象如何認識和反應，無疑應加以關注。以1911年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而論，革命行動雖歸於失敗，可是在外國駐廣州領事看來，這場革命對於外國人和中國人的生命、財產等都沒有侵犯，反而是善後的清朝官吏在侵擾士紳和民眾。外國有報紙更評論稱中國暴力運動「必不免於仇洋，已成我英人之常識。而此次竟出意外，廣東省城，外人教士叢居華人中，曾無絲毫之損。真文明之舉動矣」[37]。如果說以往的研究比較偏重外國因素對辛亥革命的影響，那麼未來研究似乎應該多關注辛亥革命在海外的傳播和影響。

四　革命的現代性

孫中山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不僅源於他的全球活動軌迹和知識來源，而且在於他始終將中國革命置於國際關係和世界潮流大勢之下。學界關於辛亥革命有一個「海外策源地」的說法，應當是根據孫中山長期在海外活動和組織、輸入革命的史實。從中國數千年歷史來看，這種推動政權鼎革的革命方式顯得有些不同，從而提示我們更要關注何以從海外策源革命能夠成功。這涉及到辛亥革命及後來中國革命的「現代性」問題。儘管有學者注重從革命話語層面討論晚清時期革命的現代政治因素，可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在思考「現代性」問題時不能局限於自己的學科視野，還需要注意自然科學技術發展變革之於中國革命的重要影響。

日本學者武上真理子在《孫中山與「科學的時代」》一書中提出應當重視現代科學技術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實踐的影響[38]。畢竟孫中山在青年時代所學為現代醫學，後來從事革命之餘又翻譯和出版了《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晚年撰述《實業計劃》，都借助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

不僅如此，孫中山首次離開中國啟航赴檀香山，便有「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的深刻記憶[39]，在辛亥革命時期周遊世界宣傳和組織革命，更是憑藉現代輪船與電報技術才能持續推進中國革命的發展。我曾經梳理孫中山在1905至1911年間以輪船為交通工具奔走於亞、

美、歐之間的二十一次海上航行，粗略估計他在船上的時間，接近三百天。這意味着在這六年多時間裏，他有約七分之一的時間在航船上思考與籌劃革命，可以將之稱為「海上革命的航程」或「船板上的革命」。此外，電報技術更是早早就融入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之中。據說1906年初，孫中山、張靜江在法國輪船上相識，約定若發動革命的時候需要資金，可在「打電報的時候依着ABCDE的次序，A字要一萬元，B字二萬元，E字要五萬元」。幾個月後，當孫中山和胡漢民在西貢籌劃革命缺錢時，即依此約定，獲得張靜江數萬元的匯款[40]。

此前大陸學界普遍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是放在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路之下討論的，其實同樣可以將之放在全球資產階級與工業革命的脈絡之下。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界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41]就此而論，辛亥革命時期的武器、通訊技術、輪船與鐵路、地圖等元素，不也正是以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為基礎嗎？

五　小結

總之，「革命的對手方」的學術視野並非要轉移辛亥革命研究的方向，而是希望不斷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歷史意涵，思考在已然成為「學術高原」的研究領域上如何築起「高峰」。

二十世紀80年代，隨着國際辛亥革命學術會議的輪番舉辦和多套大部頭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出版，學界已有忖思：辛亥革命研究如何進一步推進？章開沅因此專門撰寫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42]。世紀交替之際，他又轉述陳慶華的學術囑託：「法國大革命已經研究了將近兩百年，而且經久不衰，希望你們也把辛亥革命研究堅持100年、200年，甚至更久。」[43]

自二十世紀以來，全球的新史學思潮愈來愈多樣化，其中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從批判政治史的宏觀敍事出發，這無疑也影響到辛亥革命研究的學術前景。新文化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亨特(Lynn Hunt)對此亦有反思：「歷史學家喜好發掘證據，還偏好從新的渠道獲取證據，這意味着他們會順着特定的路徑或脈絡取證，無論這種證據是總統或總理的傳記，還是撒哈拉以南穆斯林非洲的圖書貿易路線等。視野狹窄是一種職業風險，這種風險因為學者對專業化的需求以便在某個領域做出成績而加劇。」但是她仍表現出樂觀的態

度，因為「我們仍舊需要宏大敘事，儘管它們不必是進步的故事。思考這種敘事應有的樣子是一種志業，它讓歷史學成為一個令人心生愉悅的領域」㊹。我想辛亥革命研究的宏大敘事也應如此，不必是一個單調的敘事，而是走向群樂共鳴的大合奏。

註釋

①④㊸ 章開沅：〈50年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頁238；229；243。

②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中編（上海：革命史編輯社，1928-1930）；《革命逸史》，初集至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該書最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③ 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第一至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

⑤ 陳三井：《輕舟已過萬重山：書寫兩岸史學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⑥ 章開沅：《凡人瑣事：我的回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

⑦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⑧ 安東強：〈中國「革命」意涵的古今之變〉，《文博學刊》，2025年第1期，頁71-82。

⑨ 安東強：《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脈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

⑩ 羅志田：〈學術的「對手方」〉，「理論與方法：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及其他」，《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18-20。

⑪ 安東強、姜帆：〈清政府對孫中山的認知及偵緝機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58-68。

⑫ 安東強著，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二卷（1906.1-1911.12）（北京：中華書局，2017）。

⑬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十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118。

⑭ 陳錫祺：〈學術自傳：我這一生所做的最有意義是為研究孫中山盡過微力〉，載《陳錫祺自選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13。

⑮ 安東強：〈革命的對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個學術理路〉，載馬敏主編：《近代史學刊》，第二十九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頁8-13；〈政治制度史視野中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3月12日，A04版。

⑯ 沈渭濱：〈一八九四年孫中山謁見李鴻章一事的新資料〉，載《辛亥革命史叢刊》編輯組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89-90。

⑰ 溫州市圖書館編：《劉紹寬日記》，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105，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廿七日。

⑱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831。

⑲ 《德宗景皇帝實錄》，第378卷，收入《清實錄》，第五十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939-40。

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孫中山革命活動史料選〉，《歷史檔案》，1985年第1期，頁34-41。

㉑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第14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頁671。

㉒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一冊，頁718。
㉓ 參見Sun Yat-sen, *Kidnapped in London* (Bristol: J. W. Arrowsmith, 1897)；〈論中國分黨〉，《國聞報》，1898年7月31日，「本館論説」，第2版。
㉔ Herbert A. Giles,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B. Quaritch;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98), 696.
㉕ 〈清國流亡人士言行之報告〉（1905年8月16日），載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六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112。
㉖ 〈直隸總督袁世凱致慶親王奕劻信函〉，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彙編》，第三十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112-16。
㉗ 〈巴思德致外交部長先生〉（1907年6月13日），載《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七卷，頁56。
㉘ 〈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1911年11月20日），載《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八卷，頁106。
㉙ 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收入嚴昌洪、張銘玉、傅蟾珍編：《張難先文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438-39。
㉚ 章太炎：〈與王揖唐〉，載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494。
㉛ 〈蔡廷幹上校來訪接談記錄〉（1911年11月16日），載駱惠敏編，劉桂梁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1895-1912）》，上卷（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頁795。
㉜ 〈如是我聞・孫文之言〉，《大陸報》，第2年第9號（1904年10月），「譚叢」，頁55。引自桑兵：〈孫中山革命程序論的演變與評價〉，載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辛亥革命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頁409-10。
㉝ 〈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96-99。
㉞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3。
㉟ 孫文：〈發刊詞〉，《民報》，第1號（1905年11月），頁1。
㊱ 民意：〈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説辭〉，《民報》，第10號（1906年12月），頁16。
㊲ 伯父：〈歐洲對於嶺南革命觀〉，《少年中國晨報》，1911年8月18日，第1版。引自方李邦琴主編：《孫中山與〈少年中國〉：從美國當年的報紙看辛亥革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05。
㊳ 武上真理子著，袁廣泉譯：《孫中山與「科學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㊴ 孫中山：〈覆翟理斯函〉（1896年11月），載《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47。
㊵ 鄧慕韓：〈追隨國父之回憶〉，《三民主義半月刊》，第10卷第3期（1947年4月15日），頁25-27；〈胡漢民講述南洋華僑參加革命之經過〉，載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頁188-89。
㊶ 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頁32。
㊷ 章開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頁113-21。
㊹ 亨特（Lynn Hunt）著，李果譯：《歷史學為甚麼重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131、141。

安東強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教授。